

二、符号的真三元结构和符号的身份化

认知不是被认知对象直接生成的效应，而是被认知对象，作为符号，与它代表的对象联系起来，或者，被认知对象，作为对象，与代表它的符号联系起来，生成的符号效应。世界上不同的事物是无限多的，符号和对象这两个不同事物，只有借助第三者解释才能联系起来。。所以，符号的结构是，也只能是，由符号、对象和解释这三个不同事物构成的真三元结构。可以图示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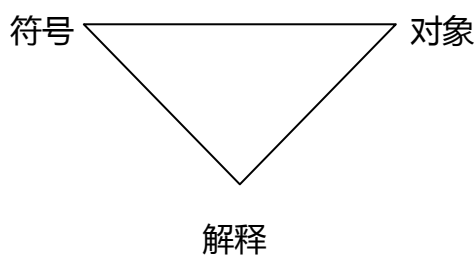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所谓真三元的意思是：三元共存共亡，三元缺其一，其他二元都不可能存在。在认知中，没有对象，无所谓符号，没有符号，无所谓对象。符号和对象只有借助解释才能联系起来。虽然解释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之后，常常功成身退，从显性转化为隐性，隐藏到记忆深处，甚至被遗忘。但没有解释，符号跟对象联系不起来，也就不可能有符号和对象。

在本符号学中，“符号”一词有两个意义：一个是代表由符号、对象和解释三者构成的真三元结构的整体，另一个是只代表真三元结构中的一个节点。这两个意义，在具体的行文中，借助上下文就能判定。没有必要，不加说明。

在这里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：符号、对象和解释都不是实体，或代表实体，而是事物在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。我们称为身份：符号身份、对象身份和解释身份。符号、对象和解释身份化思想，亚里士多德已经有了。在他说：“口语是心灵的符号，文字是口语的符号”时，实际上，他已经知道，口语只是相对于心灵，才能起符号作用，取得符号身份；相对于文字，只能起对象作

用，取得对象身份。在索绪尔提出把能指固定在语词的音响形象上，把所指固定在概念上的能指所指二元结构符号观后，符号实体化的观念使有些人在符号和语言之间划上了等号，以为语言在认知中只能起符号作用。

事实上，语言，跟非语言事物一样，可以在认知过程中，起符号的作用，也可以起对象作用和解释作用。正像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的那样，同一语词，在不同的认知过程中，可以起不同的作用。这类实例到处都有。例如：在英译中的过程中，“book”是符号，“书”是对象。在中译英的过程中，正好相反，符象换了位，“书”成为符号，“book”成了对象。在“姥姥就是外婆”中，“姥姥”是符号，“外婆”是解释。在“外婆就是姥姥”中，符解换了位，“外婆”成为符号，“姥姥”成了解释。等等。这些说明：不能在语言和符号之间划等号。

世界上的事物，当它们只代表自身时，可以存在于认知之中，也可以存在于认知之外，通过认知过程来认识。而在它们不代表自身而代表与自身不同的事物时，它们的符号身份，只在认知中有效。认知之外，没有符号，也不可能符号。

玫瑰花，只有在知道并认可玫瑰花象征爱情习俗的人群的认知中，才能获得代表爱情的符号身份；在认知之外的世界中，在不知道玫瑰花象征爱情习俗的人群的认知中，都不可能获得代表爱情的符号身份。

见面时，彼此拥抱，在西方人心目（认知）中，是善意和友好的表示；可是，在东方，特别是在东方年轻的姑娘的心目（认知）中，正好相反：异性之间的拥抱，是邪恶的。在认知之外的世界中，拥抱只代表两个身体拥抱在一起的动作自身，其他什么也不代表。它代表善意或邪恶的符号功能，只能出现在认知之中。

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符号的物质载体，如：正在朗诵的或写在纸上的诗，画在纸上或布上的画，正在演奏的交响乐，耸立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庙宇、教堂和清真寺等等。它们只有在已积累了相关认知的人群的认知中，才能起符号作用。在认知之外，它们只是一些实物和

声音，起不了符号作用。

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毕生没有获得过符号的身份。这不是它们不具备获得符号的能力，而是认知实践没有给它们获得符号身份的机会。一旦有了机会，这种能力就会显示出来。一瓶衡山老白干，多少年来，只是一瓶老白干。一旦上了“衡山老白干，喝出男人味”的电视广告，就获得了代表男人味的符号身份。

世界上，也有些事物的符号身份似乎是“终身”的，如：语言、数字、逻辑和科学中使用的符号、茅山道士画的镇邪的符等等。这是因为人创造它们的目的，就是让它们作为，或主要作为代表其他事物的符号来使用。它们除了被用作符号外，极少有其他使用价值。在它们起不了符号作用时，如英语对于不懂英语的人，数字符号对于不懂数学的人，化学符号对于不懂化学的人，茅山道士的符对于无神论者等等。人们不知道，除了称它们为符号外，还能称它们为什么。所以，仍然称它们为符号。这时的符号已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符号了。